

# 從文化的觀點論台灣的英語教學： 由「全球在地化」談起

劉建基

克里斯妥(David Crystal) 在《英語帝國》(*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一書中強調，英語之所以快速擴張有其歷史、政治、軍事、經濟、科技等因素：「英國帝國主義在十九世紀時期將英語傳佈到全世界，使英語成爲『日不落語言』；到了二十世紀，世界秩序幾乎是單方地由新興的美國經濟強權來主導；而英文也隨著美國強大的經濟勢力成爲強勢語言」(Crystal 8)。<sup>1</sup> 隨著全球化<sup>2</sup>的腳步不斷加速，英語成爲全球語言(global language)的霸權地位日益明顯，且英語國家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所佔據的中心地位愈加鞏固。因此，英語教學在台灣顯得日愈重要，各級學校無不戮力營造英語教學環境，甚至走向偏鋒。例如，元智大學中文系提倡以英文教授中國文學，並沾沾自喜，引以爲傲。

全球化的大潮勢不可當，通曉英語是台灣掌握全球溝通媒介、進入全球化體系不可或缺的要素；然而，目前台灣社會面對英語霸權缺乏「在地」的反思，過度強調學習英語的重要性而輕視中文的文化主體性，就如同歐陽江河在〈漢英之間〉一詩中所描述的大陸英語熱現象：「一天傍晚，我去英語之角散步，看見 / 一群中國人圍住一個

---

<sup>1</sup> 克里斯妥(David Crystal) 指出：「由於英語在三種使用者（以英語爲母語、官方語言以及外語）的發展，全球語言最終將不可避免地被愈來愈多人使用，英語已進展到這個階段」(4)。根據他的統計，「將近四分之一的世界人口已能說流裡的英語，這個數字正穩定的成長——九〇年代末期有十二至十五億人口能流利地使用英語。沒有任何語言能達到這樣的成長」(4)。

<sup>2</sup> 雖然學術界對於「全球化」一詞的定義意見紛歧，但將全球化指涉爲描述全球各地區因交流互動頻率提高、強度加強與速度加快，進而產生一種因「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相互依賴增強」的當代社會過程，則普遍可以爲學者所接受(趙星光 24)。例如，羅伯森(Roland Robertson)指出，「全球化的概念是指世界的壓縮，以及全球一體之意識的增強」(8)。湯林森(John Tomlinson)認爲全球化是一種「複雜相關體」(complex connectivity)的現象(1-2)。他將全球化定義爲「一種影響現代社會生活，快速發展且日趨緊密，各個層面相互依存且彼此相關聯的現象」(2)。

美國佬，我猜他們 / 想遷居到英語裏面……像每天早晨的牙刷 / 英語在牙齒上走著，使漢語變白。」<sup>3</sup> 面對英語熱的現象，歐陽江河不禁質問：「一百多年了，漢英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 / 為什麼如此多的中國人移居英語 / 努力成爲黃種白人，而把漢語 / 看作離婚的前妻，看作破鏡裏的家園？究竟 / 發生了什麼？」本論文以歐陽江河的大哉問爲出發點，旨在闡釋在全球文化流動中，我們推動英語教學應有的「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sup>4</sup>省思，以及獨尊英語對中文的戕害所造成的文化認同問題，並探討在推動英語教學的同時，應如何兼顧中文的「他者」<sup>5</sup>倫理性與在地主體性。

首先，我們來探討「一百多年了，漢英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實上，這個問題的癥結就是金耀基教授所謂的現代中國知識份子面對西方強權的「邊陲人心態」(51)，也就是我們現在面對全球化大潮下獨尊英語，忽略中文文化主體性的歷史根源。滿清末造，西方列強挾其船堅炮利之勢，強行打開中國閉關自守之局，中國遂由東亞文明的「中心」退居爲西方新世界秩序中的「邊陲」。此時，中國從萬國衣冠拜冕疏的「中心之國」淪爲西方的「次殖民地」，文化上由妄尊自大變得妄自菲薄，面對過去被貶爲「奇淫巧技」的西方文化產生極度的

<sup>3</sup> 相關資訊，參見網站

<http://lib.blcu.edu.cn/per2/zqhome/xwdx/20001030/bewoman/05.html>。歐陽江河，原名江河，出版的詩集有《透過詞語的玻璃》(1997)、《誰去誰留》(1997)。

<sup>4</sup> 社會學家羅伯生 (Roland Robertson)將“global”與“local”結合在一起，成爲“glocalize”，用以凸顯全球與地方的文化雜揉現象，以及全球融入地方，地方參與全球的理想(173)。「全球在地化」這個詞彙於是被用來說明全球與在地具有互爲主體、互相雜化的本質。

<sup>5</sup> 倫理學家列維納斯 (Emmanuel Levinas)曾以「他者的面孔」(the face of the Other)作爲隱喻來凸顯他者的「無限性」(infinity)。他以面孔(face)解釋「他者」的問題：「在見與觸的感覺中，『我』的『同一性』(the identity of I)往往含納了對象的他性，將對象變成內容。因此，臉唯有在拒絕成爲內容時才能真正顯現 (“The face is present in its refusal to be encompassed”)。據此，臉無可理解，亦即不能被含納；臉不會被看透(seen)也不會被觸摸(touched)」(194)。列維納斯的邊緣身份——出生於立陶宛的猶太人——使他體會到「他者」的「他性」易被中心扭曲、整併或抹煞。他看出主體的暴力性，認爲要免除暴力，就必須建立與「他者」的倫理關係。他強調：「他者的出現」即是倫理(43)；「他者並不依存於區別他者與我的某些屬性中」，「他者是無限超越(infinitely transcendent)，無限陌生(infinitely foreign)」(194)；「他者」是無法被代表「自我」的「整體」(the One)、「整全」(Totality)或「同一」(the Same)所整併的。這種肯定「他性」、邊緣性的倫理省思，不僅凸顯全球文化情境下弱勢「他者」所具有獨特自主性與無限創造力，並且彰顯主流、霸權論述的排他性與暴力本質。

自卑感。這種自卑感使中國知識份子對自己的語言及文化喪失自信，進而否定本國文化的主體價值。是以知識份子力倡西學，甚至主張全盤西化，要將中國文化連根拔起。激進者如錢玄同於 1918 年，在《新青年》四卷四期上發表〈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的文章，主張廢除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sup>6</sup>——將漢字視為中國「落後」西方的主因。這種對自己語言喪失自信而導致的謬見也造成後來中國欲將漢字改為簡體字，最後「進化」為西方式拼音文字的文字改革。然而，一百多年以來，中國文化並沒有在「西方的認知裡」趕上西方，反而喪失了自己的文化主體性，並且更加地「內化」薩依德(Edward Said)所謂「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價值體系。<sup>7</sup>

在當今全球化的時代，西方不再以堅船利炮強行打開中國大門，而是挾其政治、經濟、科技、網際網路的優勢，使台灣自願接受西方文化，沐浴在西風美雨之中。我們現在雖沒有消滅自我文化、消滅漢字的激進主張，但以西方為「中心」、獨尊英語、缺乏在地的反思等現象，則與清末以來的中國知識份子如出一轍。這即是金耀基教授二十年前所指陳的「邊陲人」對「中心」產生的「遠距離崇拜」(50)。簡而言之，這就是知識份子對本土的歷史文化之傳統由全面的認同而「轉向」全面的疏離，彷彿不投向「中心」、參與「中心」，則無法免於疏離與異常。這種「遠距離崇拜」的心態在今天仍然以不同的形式不斷被複製，尤其在台灣迎向全球化時代對英語的擁抱上表露無遺。大體而言，這種「淪為邊陲」的恐懼自清末以來一直潛藏在中國文化的「集

---

<sup>6</sup> 相關資訊，請參見網站

<http://www.people.com.cn/BIG5/guandian/1035/2068916.html>。

<sup>7</sup> 根據薩依德(Said)的說法，「東方主義」即是「一套關於東方的知識體系，先將東方放在一個可被接受的柵欄中，加以過濾，以便進入西方的意識中」(Said 6)。這種知識體系下所認定的「東方」是「為了相對西方而產生，是為了凸顯東方與西方的不同」(Mills 107)。薩依德指出：「東方主義其實就是丹尼斯·黑(Denys Hay)所謂的歐洲理念。這個理念是為了要彰顯『我們』歐洲人與『那些』非歐洲人(non-Europeans)的區別。而事實上構成歐洲文化的要素就是歐洲本土及海外的文化霸權：歐洲人認定自己較其他非歐洲民族與非歐洲文化更為優秀。東方主義是一種歐洲看待東方的霸權式思維，這個概念強調歐洲是比落後的東方更為優秀，且通常不屑那些有自我主見的思想家對此提出的批判」(7)。

體潛意識」之中，迫使我們歇斯底里地湧向我們所認為的「中心」— 西方。當今瘋狂的英語熱其實就是源於我們「文化集體潛意識」裡被邊緣化的恐懼。

日本名古屋大學教授津田(Yukio Tsuda) 指出，英語霸權其實就是一種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必然造成「語言與溝通的不平等」(linguistic and communicative inequality)、非英語國家人士「思考意識被殖民化」(colonization of the consciousness)，以及由英語所衍生的社會階層(social hierarchy) 差異等現象。<sup>8</sup> 他指出英語霸權「可能造成英語國家人士和非英語國家人士間語言及溝通的不平等，會使以英語為母語者對 [非英語國家人士]產生刻板印象、歧視及偏見，間接造成[後者]思考意識被殖民化，並因英語的流利度形成『國際溝通的階級結構』」(張月珍 114)。日本學者津田的批判彰顯了英語霸權的階級性與排他性的全球倫理議題。<sup>9</sup> 很不幸的是，日本學者所指陳的現象亦出現在台灣的學術界。我們教育主管當局積極主動地迎合英語霸權，採用SCI、SSCI、及 EI (科學、社會科學、及工程索引資料庫) 三項分類指標來評比學術地位與成果，以英語論文的多寡來評斷學術等級。然而，三項指標皆以「英語論文」為選樣，本身帶有「歧視非英語」的意涵，造成語言在學術界的階級化。這套標準造成以法文、西班牙文、或德文等其他外語發表的學術著作皆不被官方認可，壓抑了我們與「非英語國家」思想與文化的對話；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以自己的語言發表的學術論文竟然不被認同，將使中文日漸喪失它的文化主體性而日漸式微，成為「殘障的語言」。<sup>10</sup> 這套獨尊「英語論文」的學術標準不僅完全否定了本國人文社會學科在地化的主體價值，誤導全球化

---

<sup>8</sup> 參見 “The Hegemony of English and Strategies for linguistic Pluralism: Proposing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Paradigm” by Yukio Tsuda, Sep 11, 2000. 相關資訊，參見網站：[http://www.toda.org/conferences/hugg\\_hon/hugg\\_hon\\_papers/y\\_tsuda.html](http://www.toda.org/conferences/hugg_hon/hugg_hon_papers/y_tsuda.html)。

<sup>9</sup> 文化流動過程中所涉及的權力不均衡、關係的不對等、與等級的不平等即是全球化倫理議題所涉及的範疇。楊雪東指出了倫理議題在全球化研究的重要性：「全球化是一個不平衡的歷史進程，其中既有根深蒂固的等級和不平等，也滋生著新的控制關係和差距。而這些新舊問題在特定的時間、地點有可能激化，成為顛覆全球化的進程的力量」(192)。

<sup>10</sup> E. Haugen 曾說：「沒有一個語言是先天性殘障。」(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n inherently handicapped language.)參見 E. Haugen, “Dialect, Language, Nation,” in J. B. Pride and Janet Holmes, eds. *Sociolinguistics: Selected Readings*, p. 103.

即是「英美化」，使得台灣在全球文化流動的過程中，無法汲取全球多元文化的精髓，進而喪失了豐潤本土文化內涵的機會。在全球化的時代，人文社會學科有其在地化的必要性，因為這些學科肩負將全球文化在地化、承傳與厚植本地文化的使命。誠如余德慧教授所言，

如果這些學門一窩風都以英文[發表]，投到國外期刊，必然與當地文化消費層斷裂，許多負責文化生產的當地作者，還是以當地的語言為主，一旦人文學科洋化，我們的人文學家就應該稱為「洋學家」，相對國外研究漢人人文學的學者「漢學家」……其次，人文社會科學的被污名化，令台灣人文人才望之止步。台灣社會的人文思想逐漸凋零……本國文化失去緩衝消化的在地智能。(15)

這種情況，就如當年錢玄同等知識份子對自己的語言喪失自信，反映了「文化集體潛意識」裡被邊緣化的恐懼。這種完全以英語為尊的知識生產，缺乏在地的反思，免不了會造成國人「思考意識被殖民化」的現象。莊坤良教授沈痛地指出，「國內現在的情況是強勢英語壓倒本土語言，大家迫不及待、心甘情願的接受英語及其所代表的文化霸權」(12)。他認為「台灣雖然沒有被英語國家殖民的經驗，但是積極認同英語文化之心卻強過許多後殖民國家。缺乏在地反思的能力，迎合英語帝國的文化霸權，不但可能喪失一己的文化信心，也會對國家文化認同的形塑埋下負面影響的因子」(12)。以現今的兒童英語教學為例，過度強調全英語教學、使用原版英語教材，使我們的民族幼苗全盤接受英美文化，浸潤在在其價值體系與意識型態中，彷彿台灣是英美的殖民地。這種缺乏融入在地文化的英語學習，可能引發文化認同危機，以及對本國語言的輕忽與貶抑。在探討英語教育對母語文化所造成的衝擊時，廖咸浩教授剴切地指出，「外語學習是重要的文化創意來源，但外語學習必需在母語所傳遞之基本價值確定之後，而且外語學習必需多元化，不能只取『全球語言』這一瓢飲」(3)。因此，在英語的學習熱潮中，我們不得不慎思語言背後的文化議題，以及本國語言的在

地主體性。教育部以英文論文為學術評鑑唯一標準的錯誤示範，不僅將阻扼學術在地化的可能，更會戕害中文的發展，導致國人思想意識被殖民化，為「東方主義」所宰制。

在〈國語教育與英語教育的關係〉這篇論文中，語言學教授蘇以文認為基礎教育要與國際接軌，雙語教學是一個有益的嘗試，不過母語才是一切學習的磐石。她引述語言學家霍爾夫（Benjamin L Whorf）與卡普蘭（Robert B Kaplan）的看法，認為語言與文化本身內蘊著一套獨特的思維模式，人的思考與寫作會不自覺地受制於這套無法變更的思維模式（9）。她接著指出：「母語是一個人從生存環境中所創造的『思想』的憑藉，極少數人可以擁有兩種以上的母語，兼有不同文化的思維模式」（9）。易言之，只有極少數的知識菁英有能力透過英語，學習西方的「深層」思考模式；當大多數人無法以英語進行「深層」思考，又因一味獨尊英語、忽視母語而無法以母語作「深層」的思考時，我們文化的發展必然無法「深化」，在地文化的自主性與創造性勢必蕩然無存。凡此種種皆使得母語失去作為一「全方位語」（a full-fledged language）的活力和生機。

在全球化的大潮下，台灣的英語熱所造成的單語（全英語）幼稚園盛行、學童中文程度低落、元智大學中文系力倡以英語授課、學術論文發表以英文為佳等現象對本國語言有多大的戕害與影響，目前尚未有確切的論據。然而，鑒諸日據時期推行「國語（日文）政策」對閩南語及客家等本地語言的壓抑與排斥，我們不難看出獨尊英語將會造成嚴重的後果及難以彌補的傷害。日據時期，日本推行以日語為「國語」的單語政策，日語就像今天的英文一樣，背後有強大的政治與經濟力量在支撐，代表著較高的教育程度與社會地位，使得許多台灣家庭努力成為完全以日語溝通的「國語家庭」。對大多數受日本教育的台灣人而言，日語成為當時台灣知識階層的共同語言。在《海行兮的年代》一書中，周婉窈教授指出：「日文和新事物緊密連結在一起，當談話內容涉及新事物時，人們自然習慣用日語來表達。相對之下，本土語言（閩客和原住民語）就被剝奪了發展這方面的語彙的機會……沒有一個本土語言既存的詞庫可以足夠供他們來探討杜斯妥也夫斯基和

契訶夫等人的作品。」(121)；「到了日治末期，台灣的年輕人頗習慣日語，要他們用台灣話來作知識性的溝通已經很困難……半個世紀以來的殖民政治以及其後來國民黨統治……已經使得台灣本土語言淪為『殘障語言』，只剩下極有限的功能」(123)。現在英語雖然不是我們的本國語或是官方語言，但英語作為單一獨霸的全球語言就如同日據時期的日語一樣，代表著較高的知識程度與社會階級，使台灣人忽略、貶抑母語的重要性。如果學術論文要求以英文發表才被認可、國文系的課程都要以英文授課、學童教育以英文為尊變成常態，長此以往，某些領域的知識或新事物可能只能以英文探討，中文在台灣就會像日據時期的閩南語與客家話一樣，成為「殘障語言」，無法發展成為「全方位語」。日據時期閩南語、客家語等本土語言的殘障化殷鑑不遠，我們不能在全球化時代又使中文重蹈覆轍。

前台大外文系主任顏元叔教授在其所著的《英國文學：中古時期》一書的「序言」之中，強調他為何以中文撰寫英國文學史：「這是一部給中國讀者讀的書，也是一部企圖將英國文學納入中國文學意識的書，因此中文是唯一媒介。聖經必須翻成英文才能成為英國人的生活與情思的一部份：本土語化是吸收任何外來文化滋養的不二法門……將英國文學中文化是一項嚴正的文化轉介工作」(iv)。顏教授二十年前所說的這番話，在今天看來仍然是振聾啟聵。顏教授從在地的角度出發，強調以本土語言去轉化西方知識的必要性，不僅凸顯了「全球在地化」的意識，也揭示了「文化翻譯」可以帶來豐富的中文語彙。例如，詩人愛略特(T. S. Eliot)的文學詞彙“objective correlative”以及德西達(Jacques Derrida)的“deconstruction”被轉化為大家琅琅上口、耳熟能詳的「客觀投影」與「解構」。如果我們能以母語來表達透過外文所吸收的西方知識，則所吸納的西方知識才算真正進入我們的文化意識之中。然而，如果我們無法以母語做深度思考，又如何能以母語來表達具深層思維的西方知識？如此一來，我們不但無法把西方知識轉介到我們的文化意識之中，更會破壞我們文化中深層思考的機制。



瓦特斯 (Malcolm Waters)在《全球化》一書中指出，全球化「並不意味著世界各角落都得西化與資本主義化，而是每一組社會組構 (social arrangements)都得建立其相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的位置」(6)。同樣地，台灣的英語教學不能全盤由英美移植而來，應有其相對的、在地的主體性，同時對於本國語言不可妄自菲薄，使之淪為「殘障語言」(handicapped language)，而影響自己的文化認同，破壞自己文化中的深層思考機制。羅伯生(Robertson)的「全球在地化」觀念提供了我們對英語霸權的文化省思，以及對英語教學在地化的反思，更給予我們一個深刻的啓示：唯有良好的中文能力才能承載所習得的西方知識。置身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裡，我們不但應加強英語能力，掌握全球溝通的媒介，放眼全球；更該培養良好的中文能力，作為東西方思想交流的媒介，彰顯在全球版圖中「他者」的主體性。「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唯有以良好的中文能力作為根本，我們才能以英語作為養料，在全球版圖中不斷茁壯，找到發聲的位置；如果我們只一味擁抱英語霸權，破壞中文裡深層思考的機制，這無異「伐根以求木茂」，我們將會如無根的飄萍，被全球化的大潮所淹沒，永遠淪為邊陲。

總之，在全球化的大潮下，國人必須有在地反思能力，思索「他者」的倫理性與在地主體性。我們不應該一味擁抱英語霸權，「從一個象形的人變成一個拼音的人」<sup>11</sup>而應成為一個兼具「象形」和「拼音」的人；不該把中文看做「破鏡裡的家園」，因為中文才是我們在全球化時代安身立命之所。

---

<sup>11</sup> 引自歐陽江河的〈漢英之間〉，相關資訊，參見網站：  
<http://lib.blcu.edu.cn/per2/zqhome/xdwx/20001030/bewoman/05.html>。



## 參考書目

- Crystal, David (1997).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ugen, E. "Dialect, Language, Nation." Pride and Holmes eds, *Sociolinguistics* 97-111.
- Levinas, Emmanuel(1991). *Totality and Infinity: An Essay on Exteriority*. Trans. Alphonso Lingis.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Mills, Sara(1977). *Discourse*. London: Routledge.
- Pride, J. B. and J. Holmes, ed(1972). *Sociolinguistics: Selected Readings*. Harmondsmith: Penguin.
- Robertson, Roland(1992). *Globalization*. London: Sage.
- Said, Edward. W(1979).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 Tomlinson, John(1999).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Tsuda, Yukio. "The Hegemony of English and Strategies for Linguistic Pluralism: Proposing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Paradigm." Sep 11, 2000. Available: ([http://www.toda.org/conferences/hugg\\_hon/hugg\\_hon\\_papers/y\\_tsuda.html](http://www.toda.org/conferences/hugg_hon/hugg_hon_papers/y_tsuda.html))
- Walters, Malcolm(1994). *Globa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 錢玄同。〈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新青年》4.4 (1918年) Available: <http://www.people.com.cn/BIG5/guandian/1035/2068916.html>
- 歐陽江河。〈漢英之間〉 Available: (<http://lib.blcu.edu.cn/per2/zqhome/xdwx/20001030/bewoman/05.html>)
- 金耀基，《中國現代化與知識分子》，台北：時報文化，1983。
- 顏元叔，《英國文學：中古時期》，台北：堯水出版社，1983。
- 楊雪東，《全球化》，台北：揚智文化，2001。
- 莊坤良，〈在地性的政治：全球化、新興英文與英語教學的文化反思〉。《英語教學》27.2 (2002年10月)：1-15。
-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台灣史論文集》，台北：允晨出版社，2002。
- 張月珍，〈英語帝國的解構與再建議：網際網路全球化時代的語言文化政治〉。《文山評論》1.35(2003年1月)：105-126。
- 趙星光。〈全球化浪潮下的本土生命教育初探〉。《新世紀宗教研究》1.3 (2003年3月)：17-43。
- 蘇以文。〈國語教育與英語教育的關係〉。「國際化之路—台灣英語教育的未來」論文集。台灣大學教育視聽管，2003年8月23日：5-11。
- 廖咸浩。〈語言問題就是文化問題：談英語教育對母語文化所造成的衝擊〉。「國際化之路—台灣英語教育的未來」論文集。台灣大學教育視聽管，2003年8月23日：1-3。
- 余德慧。〈人文思想凋零，百年大害〉。《聯合報》，2003年10月21日。版15。